

芒种

讀享·九州

讀享九州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卷首语：刘麦擢芒，
锐气冲天

吴稚晖：一个
坏透了的好人

沈志华传奇：曾是中国
第一号黄金贩子

找寻真实的
蒋介石

微木填海，道心永存
——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

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这真的是民国？

尼泊尔，朝圣者的灵
魂休息所

商谈时代离我们有多
远？

经典和我们

金日成曾是中国第一支特种部队营长

目录

- 3 / 卷首语：刈麦擢芒，锐气冲天
- 6 / 吴稚晖：一个坏透的了好人
- 12/ 沈志华传奇：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 21/ 微木填海，道心永存——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
- 27/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 30/ 商谈时代离我们有多远？
——评《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
- 36/ 钱穆：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 42/ 叶曙明：这真的是民国？
- 50/ 金日成曾是中国第一支特种部队的营长
- 55/ 尼泊尔，朝圣者的灵魂休息所
- 60/ 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卷首语：刈麦擢芒，锐气冲天



6月6日，农历芒种。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田间芒种，生歌起伏，麦香入心。《月令七十二侯集解》有云：“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有芒的麦子忙着收，有芒的稻谷忙着种，是为芒种。

芒”即为忙碌，“芒种忙忙种”。顺应天时，不违农作，是天下大众的视之为当然的一种本分和本能。芒更是锋芒，“麦渐渐以擢芒”，饱满的麦粒带着一股锐气刺向天空，锐不可当。

任何一种收获，不可能无劳而得；任何一种获取，也不可能给予慵懒无锋芒之人。一如人生的耕耘、成长、灿烂与收获。

人一辈子一定要巅峰一次。

胡适用戏谑的“打油诗”回击陈腐的古文，为白话文运动注入动力，成就他一生的最高点；“五四”一代，正值青春年少，他们用刀锋和激情将中国带入一个青春时代。锋芒露后方有有获，忙碌实干方有所得。

正因为此，芒种便是一种忙碌的幸福，抑或一种兴奋的辛劳，锐气十足，而又饱满希望。正如人生一般无二，潮起潮落，有巅峰，亦有低谷，对于常人而言，难在无力、无心因时而动。

锋芒毕露之时，自当顺意展露；低谷之时，自该低首砥砺。一如徐复观所言“铺平人生的道路”，畅快地宣泄之后，也要回归内心。

收获昨日的所得，寄种明日的希望。生活中，每一缕锋芒的显现，都是汗水的一次凝结与升华。“忙中寄种，芒中隐锋”，忙碌酝酿着锋芒，锋芒中映射着曙光。

春逾暑来，夏至未至，《读·享|九州》刚到第四期，虽未到展示锋芒之时，但我们一直在期许，在用忙碌和努力准备迎接属于你我的芒种收获时节。愿您在这六月芒种之时，心有所获，锐气冲天！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6月6日



文明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一个坏透了的好人”吴稚晖

——《吴稚晖全集》出版座谈及读者交流会



时 间：2013年9月11日14:30—16:30

嘉 宾：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张海涛，九州出版社总编辑

主 办：九州出版社 《作家文摘》报社

媒体支持：腾讯文化 搜狐读书 新浪历史 凤凰读书 《中国新闻出版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

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 耿云志

吴稚晖曾不止一次，也不止向一个朋友说过，他在南菁书院读书时的一段故事。他看见他的老师黄以周的书房壁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耿云志：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邀请我来参加座谈会，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对吴稚晖比较熟悉，知道这个人物很特殊，有他非常独到的东西。《吴稚晖全集》今天就出版了，九州出版社的朋友们很了不起，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我今天就我以前知道的内容发表几点想法。

吴稚晖曾不止一次，也不止向一个朋友说过，他在南菁书院读书时的一段故事。他看见他的老师黄以周的书房壁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吴稚晖说，这八个大字对他产生终生的影响。胡适先生在纪念吴老先生的文章里，即以这八个大字作为副标题，在论述吴氏的反理学精神时，也是以这八个大字为中心。

这八个大字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人

做事特别较真，一定要求个真是真非，求个准理。这就是“实事求是”。二是认得真是真非之后，站在“是”的一边，沿着“是”的一条路走下去，绝不模棱两可，绝不和稀泥，绝不作调和派，搞折中主义，两面讨好。这就是“莫作调人”。

这两条其实真正实行起来，相当不易。但吴老先生可说是说到做到。要做到这两条，首先必须看事情看得真切，见理见得透彻。吴稚晖能做到这一点。试举一个例。

1923年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当时参与争论的两方人士，大多仅仅围绕着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争论不休。胡适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序时，虽也不满意大家未抓住要领，但他所认为的要领，也只是要说明“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会产生怎样的人生观”。过了几年之后，胡适悟到，当时只有吴老先生看到问题的真正焦点——是理学与反理学斗争的继续；是所谓精神文明论与物质文明论的对立；是走心性修养之路还是走格物致知之路的分野；是人生观与人死观的根本区别。

吴老先生把人生说得极其透彻明白，他认为人生不过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

里出台演戏。请作如是观,便是人生观。”说得直白,听了好像很不雅,其实就是如此。人在这个人生大舞台演戏,先要活着,于是,要吃,要穿,要住,产生了种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所以要动手动脑去劳作,做器具,帮助生产。器日益精,产品亦日益精,于是生活品质提高,社会进化,人自身亦进化。可见,一切都源自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物质的需要。没有物质,精神就化为乌有。所以,吴稚晖的人生观里,开除了上帝,驱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之类。什么孔孟之道,心性修养,都需在满足了衣食住以及生儿育女等等纯物质的需求之后,才能顾及。

古代人,生产力薄弱,官僚、贵族依靠劳动者的血汗,在满足物质需求,尚有余裕的情况下,讲究一些精神的需求。他们有独占优势,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到这个精神领域。于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高官贵族们就越把这些精神性的东西,说得了不得的重要。有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才可以上通于天,通于神。可以增福、永寿。所以,精神生活被过分夸大,说什么,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说什么中国有高度精神文明,而西方人只有物质文明等等说法,都是

骗人的。张君勱一流人,也许主观上不是存心骗人,但客观上,这肯定是骗人的。精神文明肯定是要的,但第一,精神文明必定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二,不能在不顾及广大群众的生存状态的情况下,追求少数人的精神文明。违背这两条,片面强调和夸大精神文明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自古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斗争,宋以来的理欲之争,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都是如此。



吴稚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其见解最透彻,最直白。

一件事就是他最先提出“清共”的问题。从共产党人的立场,当然这只能说明吴的“反共”。但从中国政治史、革命史的角度来看,说明他比别人早一些看出国共必然分裂,必须分

裂。其实国共合作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从学理上说,不同政党间,在一定时期,在某一政略或政策上达成共识,就可以合作,目的达到后,再各干各的事情。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说,当时最大的敌人一是军阀,一是列强。而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可以建立某种合作。但合作的形式,按道理,既然是两个不同的政党合作,当然只能协议式的合作,不可能两党合并,既合并,就不是两个党,而是一个党了。但提议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又要求加入国民党只能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事本身就非常的玄乎。所以,当初陈独秀等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没办法,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物质上靠国际的支援,理论上要受国际的指导,小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按国际的指示办。但在实行中,很快就暴露矛盾。两个党,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所用手段不同,又有个领导权问题,没法不矛盾。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一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各地农民运动搞得天翻地覆,直接冲击了国民党各级军政干部的利益,再加以领导权这一敏感问题,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日益产生反感。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吴稚晖看出,共产党是国民党最严重的威胁,吴稚晖断定国共合作必须终止。从另一个角度看,吴稚晖认识到两党的根本分歧,认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最大威胁,恐怕很难说他看错了。

不仅如此,吴稚晖稍后还看出,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的时候。这大约是他提出“清共”的问题不久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出共产党将来会“大得意”,不能不说,他很有远见。



我们前面说,共产党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在中国,内忧外患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谁抓住人心,抓住大多数,谁就会在政治上占得优势。吴稚晖已看到共产党的这一长处,并意识到,在相当一个时期,国民党无法把已被共产党拉过去的群众再拉回来。所以,他断定,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时候。

但吴稚晖不是一般政客,不会因看到共产党会得势,他就去转而拥护共产党,他一生坚决不做调和派。他认准自己的道理,一生坚持反共。

最后,想谈谈吴稚晖做人的一个方面,也很体现了他“莫作调人”操守。

一是他一生坚持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素食。从不讲排场,过着一种近乎清心寡欲的生活。

二是他能彻底免俗,从不请客送礼,也从不接受送礼,从不做寿。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中国人太讲究这些了。你要完全拒绝这一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吴老先生能做到这些,实在令人敬佩。昨天是教师节,我感触颇深。我多次强调,要学生们不要送礼物,可是终不能杜绝。我昨天再次强调,并引证吴稚晖的例子。要用吴稚晖的例子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检验我们今天的官场风气,我们真应该感到惭愧。

提问 1:胡适先生跟吴稚晖先生的生活方式以及言论有很大区别,如果用东方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结合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制度?谢谢!



耿云志:确实没有真正构得上理想的制度,只能就现有的国际国内形式选择一种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一种统治,任何制度都会产生弊病。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修养,东方和西方确实可以有不同,但现在宣传的一些东西,或者国学讲的一些东西,我不以为然,中国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里面最核心最要点还最有价值的是塑造君子人格,人格修养方面儒家里面有不少东西可以借鉴,可以继承和发展。但用孔子那套东西治理现代国家不可能,因为现在不是以前。所以我想,制度和个人修养可以有某种不同,有某种距离。比如韩国、台湾包括日本选择了类似西方的制度,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生活还是保存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所以要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在日本、韩国、台湾可能发现得更多,在

大陆有些东西好像已经丧失了。谢谢！

耿云志：大家经常在书中见到引用吴稚晖的话，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割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连结。吴稚晖的原话是把线装书扔到茅厕去。等我们把的经济搞上去，国家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后，再过三、五十年整理国故也不迟，原话是这个，我补充这点。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吴稚晖全集





沈志华传奇：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 吴虹飞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沈志华 1950 年出生。1968 年应征入伍。1979 年考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的再转型》、《冷战中的盟友》等，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 卷)等文献资料集。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借助新公布的苏联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有出入,招来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对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是去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材料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

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青年时期的沈志华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

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军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73年的考试。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的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怎么回事。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

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那篇著名回忆文章中讲的一样，“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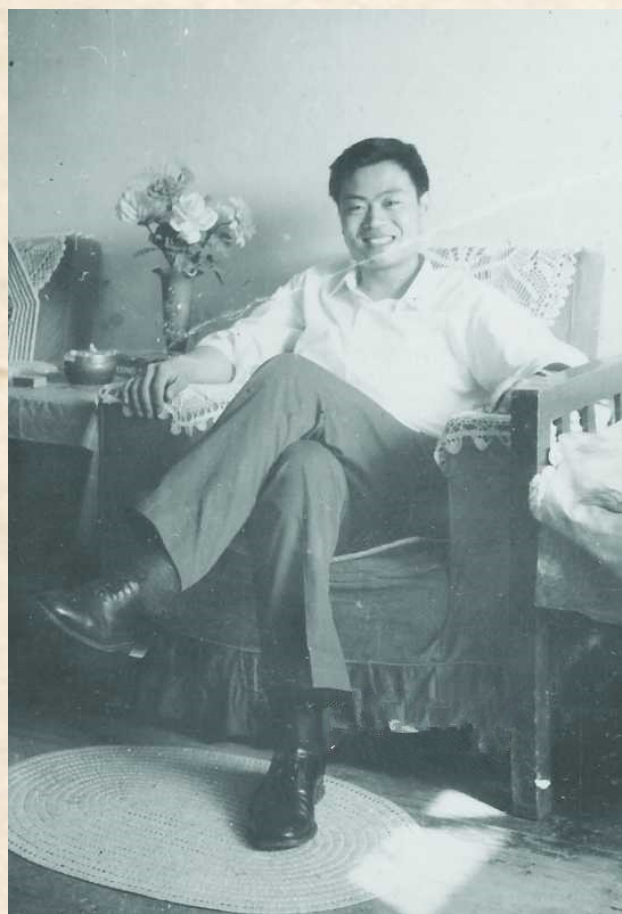
这篇文章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研，他的通知书生生就给领导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

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28岁的沈志华，此时他正准备研究生考试

在监狱里做学问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

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春节

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要出一套外国学术丛书“20世纪文库”,缺人审稿。于是找到了沈志华。他放弃了南方已经稳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元。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完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88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回去又挣钱去吧,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

金。”

“后来，海南省的银行的人，黄金处的人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我们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40岁开始的好运气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

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

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为有名的学者。”

30美金雇用俄国学者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需要一个官方身份。“没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罗斯，才发现那里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难以忍受。“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而且特别贵，一页一个

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2.8美金。”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再就是去美国复印档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苏联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

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

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的,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历史学家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人们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就会去思考。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历史是什么?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

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你仔细听,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人物周刊: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感受如何?

沈志华: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架行政机器。意志不坚定,或者说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搞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你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大家都在争项目,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一天到晚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没有人做学问,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什么学术上的打算？

沈志华：我在的华东师大有了一个专门的“冷战史研究中心”，学校也很重视。学科建立，人才培养，都有了很好的环境。

我自己这方面，最近资金托管上遇到一点小麻烦，没法再投入很多了，好在也不用自己贴了。另外，我在上海有一批企业家朋友，素质很高，也愿意为文化做点事，也信任我。所以我想将来还是会做一些支持学术的事情，把好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基金，资助档案收集整理。博士生有好的课题，也可以来申请。比如很多至今研究很薄弱的领域，比如建国之初大城市的接管工作、秩序的恢复等等，我们可以给你条件，让你跑档案，查资料。

人物周刊：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沈志华：当初没有学好英文，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受限制。当初我跟李丹慧（沈志华夫人）商量，女同志学语言快，想让她学，哪怕是专门到国外呆两年都成。但人家自尊心强，不干。（大笑）说凭什么你搞专业，我就要学英文。现在老了，很难学了。



相关图书

《冷战五书》

沈志华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微木填海，道心永存——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

◎ 朱学东 来源：腾讯《大家》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因为两岸政治的阻隔，以及我个人的阅读偏好，我一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此，徐先生于我，只是一颗遥挂天边的星星。

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徐复观全集》，其中有一本文集，《学术与政治之间》，厚达550页，但我一入眼，读诸版徐先生的序言，便相见恨晚，不忍放手，及读内文，更是如此。

文集多是旧文辑录，大多成文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这一时间段，正是国民党退败孤岛，共产党建政大陆，退败孤岛的国民党和随迁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大陆是如何失去的。

但是，徐复观作为蒋介石曾经的核心幕僚，卸甲（徐在蒋侍从室挂少将衔）之后，授课之余，其反省的远远超越了国民党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他更是在思考国家兴亡，中国社会如何摆脱专制，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衢，思考中国传统中那些延续保护了中国文明的基因，如何与现代政治社会文明发展对接，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同时还能葆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央日报首任社长，我武进乡贤程沧波先生，在为徐先生此书写的书评中，毫不吝啬赞誉之词，称“他今日的文名，他今日所代表的呼声，正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也是自由中国第一位大政论家”，更推崇徐先生是陆宣公、朱

紫阳和黄梨洲的混合体。

至于徐先生当得当不得这盛名，每个读者自有判断。



徐复观先生，1963年于东海大学家中

在我读来，《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本文集里所阐述的政治观点，所发布的对于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研究，其所提出的问题，许多恰如为今天所写。这些历史的先声，振聋发聩，至今回荡不绝。自然也让我黯然神伤。

我读《学术与政治》之间，常不由自主浮想联翩，总是摆不脱其文指陈现实的感觉。

历史的圈圈，兜得实在可怕。

《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书，内容不外两大类，一类关于现实政治的评论，一类关于学术研究的梳理。现实政治的评论，以民主政治统领，拳拳之心，抨击时弊，恺切中理，故程沧波誉其为“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学术研究的文

字,依然浸透着现实的关怀,冰心一片。

在徐先生看来,中国的未来之路,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

“专制时代的‘权原’在皇帝”,“民主时代的‘权原’在人民”,明白了这一关节,于是,“中国圣贤千辛万苦所要求的圣君,千辛万苦所要求的治道,在今日民主政治之下,一切都经常化、平凡化了”;“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矛盾,及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历史悲剧,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中国的治道》)

殷海光先生读到《中国的治道》这篇文章,称其“立言着意深远……真是空谷足音,无论作者在该文中所提论据是否确切不移,他在结论中所指出的中国政治问题底根本解决原则,至少在读者看来,是铁定如山的原则”。(《治乱底关键——〈中国的治道〉读后》)

我读书中徐先生和殷先生文,恰如余音绕梁,让我百感交集。我忍不住在微信中说,当下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品读1953年徐先生和殷先生先后发表在《民主评论》和《自由中国》上的这两篇文章!

可惜。

作为现代深谙儒家精神的人,徐先生提

出,“我们今日只有放胆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而把儒家的政治思想重新倒转过来,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再做一番体认。首先把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统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转而为自己站起来的民主。”

是的,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站起来的民主,而不是统治者口中的民本。

民主政治的本质,在徐先生看来,就是敞开人生的大门,铺平人生的道路,在已经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地不谈政治而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为了要使每个人都能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便须首先共同争取这种敞开人生之门的政治!(《政治与人生》)

“大家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之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针对一些民主的表象,那些“假把戏”的“选举”,徐先生指出,一定要在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空气之中,才算是民主的选举,“关键只在‘老老实实’四个字。此中占不得便宜,出不得新花样”(《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一文中,徐先生认为

民主自由是一种态度,而儒家精神、人文精神,是成就人格人生的一副良好态度,也是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则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的客观化。不过,这儒家精神,徐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是“把人当人”的精神,这倒真是契合了民主自由的精神的。

徐先生对于民主政治的叙述,60余年后沧海已成桑田,但读来犹新,让人唏嘘。不惟如此,像徐先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的分析,对于当年击溃中产阶级的力量的判断,也仍历久弥新,余响不绝。

至于徐先生对先秦及后世儒家的分析研判,读来于我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地方。

比如,在《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中,许多观点,于我既有修正也有指引。比如,徐先生说,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在政治上的若干观念,如爱民、纳谏、尊贤、尚德、兴学、育才等等,已成为二千年来论定政治及政治人物是非得失的共同标准”,这样的标准,在20世纪初之前,即便是最愚蠢最凶暴的人君也不敢不加以承认,“最低限度,哪怕在最黑暗的时期,也提供了人们向前挣扎的一个指针、一个方向。这是在我

国历史每一次存亡绝续之交,都可以明白看出来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现实政治之外,还敞开了一条人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立生存之路……人们虽生存于专制政治之下,还可以过着互相教养、互相救助的人伦生活。虽然有时政脉断绝于上,而教脉依然延续于下”;“在这种(专制的)胡天胡帝中,儒家思想有形无形地、多多少少地尽了一点提撕缓和的作用。而最主要的还是靠儒家思想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中形成的一个人伦社会于专制的隙缝里面,作为活动的基盘,以延续民族的命脉”。

但是,即便这种有限空间,如殷海光所言,在斯大林式的政治中,却再也找不到了。

徐先生也在许多地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后世儒家的苟且,比如科举制度,比如士人政府,都是极其的发人深省。

即便认为孔子之教延续了民族命脉,但徐先生清醒地看到,它“并未能完全解决民族在政治这一方面的问题,因而中国历史始终陷于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

所以,徐先生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来

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顺理成章了,但多少有些牵强:“顺着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自然要表现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完成它在政治方面所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使命。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和儒家的基本精神接上了头,才算真正得到精神上的保障,安稳了它自身的根基”。

不过,庆幸的是,徐先生的儒家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文明的要义,那就是徐先生总结的先秦儒家的“把人当人”,这个精神,“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中历尽了艰辛挣扎之力,且为我们迈向将来的永远指针,及我们渡过一切难关的信心之所自出”。(《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

1956年,徐先生在这本书甲集自序中说:

“我认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这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证明说此一时代的终结。”

这个结论,一正一反之间,正可以用来观照我们的时代。

1980年,徐先生在本书新版序言中,再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假定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只在一个土生土长的茅屋书生,面对国家兴亡,世局变幻,所流露出的带有浓厚呆气憨气的诚恳期待;待望着我们的国家,能从两千多年的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民主法治的大道。待望我们的文化,能不再受国人自暴自弃的糟蹋,刮垢磨光,以其真精神帮助世人读过目前所遭遇的空前危机。我所能做的实在太渺小了,渺小的毫不足道。但精卫绝无填海之力,却不妨他抱有填海之心。读者若能于文字的呆气憨气中有以谅其区区填海之心,便是我的大幸。”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我辈生亦晚,无缘得见贤哲风范,但仅读其书,其文朴实,其理亦正,其心亦坚,其情亦深,高山仰止亦步亦趋之心顿起。

哲人其萎,遗响犹在。

微木填海,道心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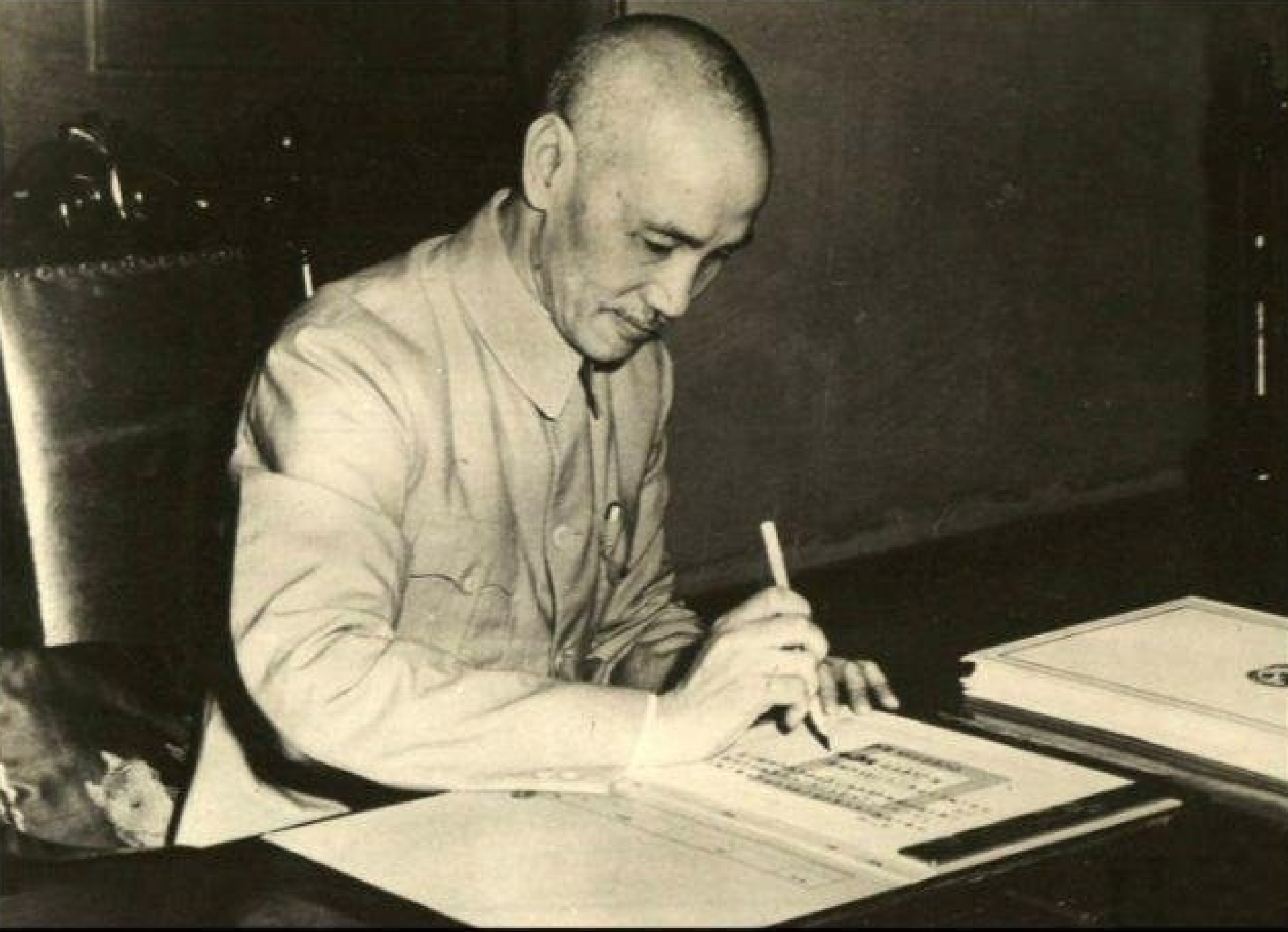


(《徐复观全集》，作者徐复观，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

《徐复观全集》书目：

-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诗的原理》；
-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五、《中国艺术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 六、《中国文学论集》；
- 七、《两汉思想史》(一)；
- 八、《两汉思想史》(二)；
- 九、《两汉思想史》(三)；
-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 十四、《论知识分子》；
- 十五、《论文化》(一)；
- 十六、《论文化》(二)；
- 十七、《青年与教育》；
- 十八、《论文学》；
- 十九、《论艺术》；
- 二十、《偶思与随笔》；
-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
-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 二十六、《追怀》。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唐山

表面看,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新推出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辑是由 13 篇论文组成,彼此相对独立,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碎片化时代,历史研究亦难免俗,随着细节考证日渐繁琐,一切整体性解释都变得摇摇欲坠。



杨天石

表面看,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新推出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辑是由13篇论文组成,彼此相对独立,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碎片化时代,历史研究亦难免俗,随着细节考证日渐繁琐,一切整体性解释都变得摇摇欲坠。而本书的难得之处,在于坚持了“大处着眼”的史学方法,直面大课题,深入大人物,使读者能从历史之“大”中,得到启迪。

“林世良与许性初案,依法惩治,不为权势所乱,此事虽小,实为以后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关键,对于国家与人民及法令皆有重大影响,此心自觉安平非常也。”1942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林世良,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深得宋霭龄喜爱,一度有望与

其二女儿结为连理。许性初是意大利皇家大学博士,时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经理。二人皆为孔祥熙铁杆爪牙,因走私被军统告发,孔祥熙亲自出面,请戴笠网开一面,并称“委员长处(指蒋介石),由我负责”。不久,军法处给出处理意见: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3年执行。

收到报告后,蒋介石当晚召见相关人员,怒斥判决不公,下令处死林世良,判许性初5年徒刑。

仅以1942年情况为例,蒋介石亲自批示枪决的贪官多达十余人,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平均月薪为3697元),即被判处死刑。然而,“严刑峻法”却没能起到震慑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们在各地胡作非为,很快便令国民党民心尽失。

事实证明,蒋很早意识到腐败将亡党亡国,他在日记中曾愤怒地写下:“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可奇怪的是:直到国民党大陆政权彻底崩溃,腐败问题也未能改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采取的方法是坚持在传统人治的框架

中予以解决,大量培植亲信、党羽和特务,从扶植励志社、军统、特侦贪污队,到手订《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可始终收效甚微。

传承千年的人治体系始终有一个巨大的BUG,即在位者自己。当蒋介石知道蒋纬国也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了一套房子后,虽又惊又怒,却只是下令将其退还了事;而蒋经国反贪遇阻时,蒋介石竟不顾前线吃紧,匆匆飞到上海去平息事端,傅作义因此愤而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本人自律尚严;可最大贪污犯都藏在其亲信中,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提供错误信息,误导决策。蒋介石曾计划让胡适当总统,以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实现国内各派和解,却遭亲信们泣血对抗,他们用无比激烈的方式来表演“忠诚”。蒋反复表示,逼他当总统,很可能大陆不保,可最终只能乖乖就范。

类似“逼宫”其实绝非一次,从拒绝在《延安协定》上签字,到重庆谈判的被动,乃至1946年政协会议失败,蒋始终被身边人牵着鼻子走。他不明白,为何总是帐下无人。其实,不是手下人无能,而是制度不臧,个体利益遮蔽了共同利益,随着“忠诚的反对派”纷纷被干掉,剩下

的自然只有“不忠诚的赞成派”,他们宁可寄生而共亡,也不愿一起奋斗,专制主义的逆淘汰机制,最终窒息了任何变革的可能。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先生已“找寻”了很多年,和前两辑一样,本辑钩出诸多历史细节,纠正了种种误说,其中不少篇章属于开创性研究。

“大处着眼”,所以登高见远,也许,只有沿着这个进路,我们才能懂得: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更非一句“曾经”那么轻松,因为一切历史都与当下相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

杨天石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商谈时代离我们有多远？ ——评《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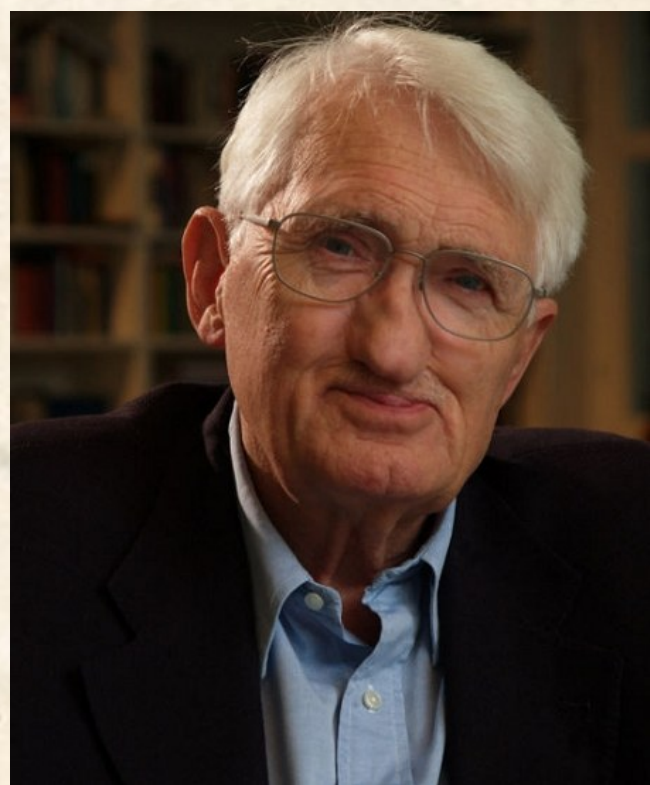
◎ 陈玉生

陈勋武教授是哲学家，其力作《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主要从哲学角度梳理了哈贝马斯的重要成就和贡献。哈贝马斯通常被称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社会学家，他其实更强调自己是社会理论家。

陈勋武教授是哲学家,其力作《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主要从哲学角度梳理了哈贝马斯的重要成就和贡献。哈贝马斯通常被称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社会学家,他其实更强调自己是社会理论家。我从事社会学专业,陈教授大作正好在我所知社会学传统中的哈贝马斯侧翼构建了一个哲学传统中的哈贝马斯,打开了透视哈贝马斯思想的一扇新窗口,丰富了一些我曾忽视或不重视的视角和知识点。社会学侧重梳理哈贝马斯理论的社会学传统,比如,马克斯·韦伯、帕森斯、戈夫曼等人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比较哈贝马斯与福科、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家之间的理论。但考察的理论文本是相同的,关怀是一致的,比如,在社会学课堂中,现代性是核心命题,而社会行动和以可能与社会(世界)秩序何以可能则是核心问题,陈教授同样分析哈贝马斯有关现代性、交往行动和社会秩序等论题。哈贝马斯正是因为具有时代的关怀,并在深层理论上进行探索和构建,为我们时代注入新的知识养分,启示人们迈步的方向。正是这个意义上,陈教授将哈贝马斯视为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哈贝马斯引领着什么?概而言之,一种商谈思潮,一个商谈世界,

一个商谈时代。

我们先说说商谈一词。陈教授大作结语时说自己平时用英文写作,现转回用中文写作有些不适应,实则引经据典、文笔流畅,需要提及的是一些专业术语、书名和人名的翻译与大陆通常使用的不同。“discourse ethics”就是其中一个,陈教授翻译为话语伦理,也有翻译为商谈伦理或商谈伦理学及对话伦理或对话伦理学。我认为将 discourse 译为商谈比较合乎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合乎中国语境。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奠基之作就是其《关于交往行为的理论》,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交往行为理论》。陈教授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

“1981年,德国哲学家约根·哈贝马斯发表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巨著——《关于交往行为的理论》,其交往理性的理论与新的现代性理念横空出世,在西方哲学界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一场西方哲学的革命由此产生。”为了奠定交往行为这个基础,哈贝马斯首先从理性与合理性概念概念入手,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是工具行为合理化的社会,人受到了异化,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使得社会工具理性化,抑制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弃理性,而是重建人类理性,提出交往理性,并因此为现代性辩护,雄心勃勃的开启现代性工程和研究计划。

哈贝马斯首先要在主体或本体之外确定行为合理性、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基础,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系列讲座中提出“理想的对话情形”,古代罗马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辩论,受权力压迫性的谈话就不合理。这种辩论场景是照面式的。哈贝马斯进而论证,谈话就是为了共识,这是非常合理性的,极端地说,即使是骗子,首先也要谈话,并且要以共识为谈话取向。但是,要谈得来,达成共识,谈话有“真、正、诚、通”四个有效性要求(validity claim),就是真实性

(truth validity claim),即呈现出某种事物时命题内容是真实的;正确性(rightness claim),即言词行动是正当得体的,与社会认可的期望相一致;真诚性(sincerity claim),即商谈者命题意向是真诚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 claim),即言辞意义是可以理解的。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和世界秩序谋划的基础,所以要以此引申出几个理论问题来说一说。哈贝马斯理论设计的原型是古罗马广场式的自由辩论,是照面式的谈话,彼此知道或根据言行可大致判断彼此的身世背景、谈话企图等,此其一;其二,谈话双方都预留了各自的生命史,也就是说,谈话是有路径依赖和时间因素影响的。这个理论适用到简历正当的政治性正义概念时,罗尔斯提出异议,认为照面式的谈话这种机制并不是最合理的,因为难以避免人们的好恶。最合理的机制是什么,罗尔斯提出设想的原始地位,就是每个参与讨论制定一个政治性正当概念的人对自己现在的、未来的,对他人未来的身份、地位和利益都不知道,而处于一种“无知之幕”下商谈。卢曼的商谈理论也设计在谈话双方历史背景清零的基础上展开。

很有意思的是,谈到宪法爱国主义的时候,哈贝马斯特别强调要放弃传统和历史偏见,放弃民族爱国主义,搞宪法认同和宪法整合。因此,哈贝马斯对商谈的机制和秩序与对世界的秩序和整合机制在理论设计上是有差别的,但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

在宪法爱国主义中,公民身份和资格不是以公民的民族属性为前提,而是不同宗族、种族、信仰、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在认同共同的民主宪法及其理念和价值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组成国家。哈贝马斯批判斯密特为代表的“一族一国”理念,认为他制造出人民与人类在民主中的虚假对立。陈教授因此写道:“宪法爱国主义的人民主权、人权、民主与宪政国家在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共和国家理念。……民族属性不重要,更不用说它是民主与宪政国家的基础和人民主权的内涵或前提。”哈贝马斯强调宪法爱国主义,倡导宪政民主,真正目的是世界秩序,他提出欧洲宪法化、多元的世界社会宪法化等理念。这些理念,首先就要扫清民族化、宗教化的世界秩序障碍,将国家与民族拆离,以宗教宽容、重叠共识实现宗教多元主义。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和照面式商谈机制,用来回应和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错综复杂的生活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问题。针对这些时代问题,陈教授认为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精神中的核心理念,包括理性理念、现代性理念、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全球正义理念、世界主义理念、人权理念、反人类罪理念、宽容理念和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作出了贡献。

但在理解这些理念时,陈教授强调要采取后形而上学即后本体论式思维方式,如把世界秩序理解为司法性秩序,人权是司法性权利,全球人权政治必须司法化,否则它将堕落为人权原教旨主义政治。哈贝马斯后本体论强调的是过程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商谈的过程,虽然是照面式商谈,不回避生命史在商谈系统中的存在,但强调商谈过程要民主;二是

强调商谈共识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宪法或基本法,如国家宪法、欧洲宪法、世界宪法,通过宪法共识实现社会整合。任何单方面强调商谈或强调法律规范,都不能保证正义。

理解这些理念同时还要立足三大原则:话语原则,即商谈的所有参与者同意和接受,一个伦理的基本准则才正当有效;普遍性原则,即只有遵从它的正负实践效果对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是可接受的,一个伦理的基本准则才正当有效;民主准则,即公民同时是法律的受制约者和创造者。也就是说,规范是大家一起参与创造出来的,该规范可能造成的个人利益得失都可接受,每个人都愿意受其制约。

哈贝马斯雄心勃勃,高举商谈伦理理念,开展全球性演说,刮起重整世界秩序之雄风。哈贝马斯批判康德设想的国际共和秩序,倡导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秩序,谋求全球法律秩序。商谈伦理理念在微观方面运用到很多方面,住区规划不再由建筑商、开发商和设计师说了算,还由准居民协商确定,设计出个性化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基层治理中,搞古罗马广场式的民主议事会,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但是,在世界秩序方面,中东冲突、东南亚区域关系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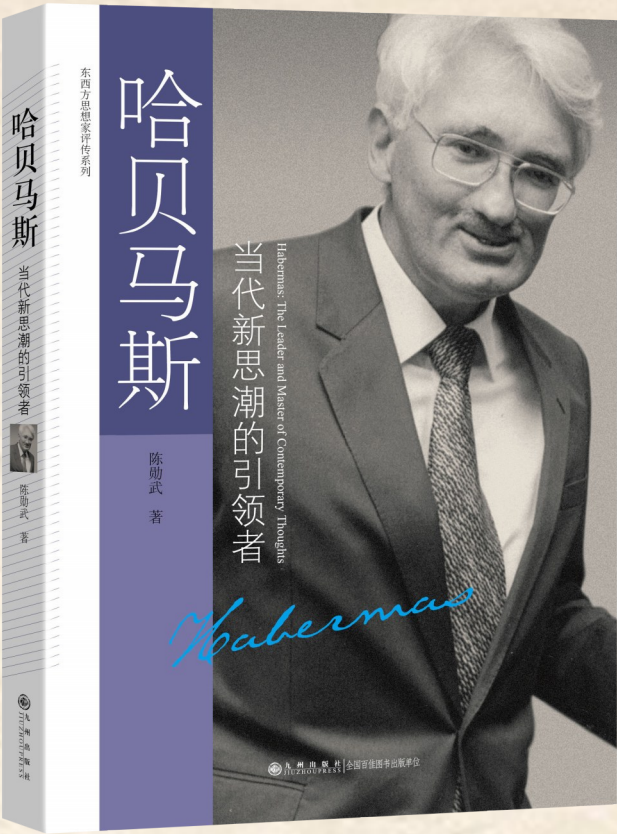
张、北约东进、区域宗教与民族冲突等区域关系问题,全球核武、全球生态环境、全球人权、全球反饥饿、全球反恐、跨国食品安全等问题,这许多问题是国家之间关系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商谈解决。就目前形势而言,国际社会虽倡导商谈,但商谈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哈贝马斯普遍民主和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司法秩序设计仍然是一种理想。

对于中国,当前基层治理问题、新疆暴恐分子问题、南海岛屿争端问题等,使得如何处理好公共治理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成为急迫研究的课题。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协商民主作为重要政治制度设计提出来,虽然这并非照搬哈贝马斯的理论设计,而是基于中国政治协商、基层民主自治等制度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现在,从现实和政治两方面似乎都要求中国开启一个商谈时代。这与哈贝马斯中国之行时不同,那会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到两年,人们对其倡导的后民族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思想比较敏感。

但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我们离哈贝马斯设计的商谈时代还有很远的距离。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一书中提出“文明自主”概

念,指每个人既懂得自己的基本人权与权利,又懂得其他人的基本人权与权利,以及自己对又懂得他人的基本人权与权利尊重的义务。这里的基本人权与权利包含着宪法规范的体现,这里的懂得要求人们对法律规范知识的掌握,法律不仅是一个行动系统,也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再进而拓展,文明自主当然包括商谈本身。按照哈贝马斯设计,交往理性要求真、正、诚、通,要求人们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才能完成理想的商谈过程。所以,商谈时代是我们不断商谈,其法律规范是商谈后达成共识并被普遍遵守和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法律规范,在处理意见纠纷时,商谈压倒暴力、战争、意识形态控制、对抗等形式。商谈时代是人们放弃了本体的执着,学会了商谈,并热衷于商谈,在商谈过程中和宪法中维护世界秩序的时代。

总之,陈教授以哈贝马斯重要著作为基础、主题和线索,围绕当代重要理念展开剖析,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引领商谈时代潮流的旗手,一位引领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



相关图书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

陈勋武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 钱穆

中国人生以内心情感为重。不尚男女之爱，而特重夫妇之爱。由夫妇乃有家庭，有父母子女，由此再推及于宗族、亲戚、邻里、乡党，而又推之全社会，全人类，皆本此一心之爱。此爱在己，但不轻易发之。

中国人生以内心情感为重。不尚男女之爱,而特重夫妇之爱。由夫妇乃有家庭,有父母子女,由此再推及于宗族、亲戚、邻里、乡党,而又推之全社会,全人类,皆本此一心之爱。此爱在己,但不轻易发之。故未成年人,则戒其言爱。必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慎重选择。所爱既定,则此心当郑重对之,死生不变。此心之情感,实即吾生命所系。

中国文学则多言夫妇之爱。姑举人所尽知之现行国剧,择其中之五剧故事为例,稍加申说。

大登殿

王宝钏的悲喜人生



首及王宝钏之寒窑十八年。其夫已远离,音讯久绝,然王宝钏爱心不变,寒窑独守,千辛万苦,不言可知。然所爱虽在外,此心之爱则在己。己之此心,则实我一己之生命所系,外

面境况可有种种变,惟我一己之生命则不得变。千辛万苦,皆在我此生命中,故亦安之若素,不轻求摆脱。非不求摆脱此苦,乃不求摆脱此爱。若求违离此苦辛,而亦违离了我爱,即不啻离了我此生命,乃为万不值得之事。

王宝钏尚有父母,亦其所爱。其父乃当朝宰相,大富极贵,王宝钏亦尽可离此寒窑归父母家,岂不仍可享受一番安乐生活?然中国人观念则不然。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宝钏一家之主乃其夫,其夫于岳家有不乐,宝钏乃推其夫之志,故乃不归父母家,而独守此寒窑。否则宝钏若以其一身生活之辛苦与安乐为选择,离寒窑归其父母,则宝钏夫妇一家早不存在。

中国人以家为重,故计不出此。而其夫亦终于十八年后,重归寒窑,重访其妻,而其夫时亦成一大贵人,其权位乃转居其岳父之上,于是乃有剧中《大登殿》之一喜剧出现。苦尽甘来,此为中国人理想所归往之一境。

其夫在外十八年,已成一大贵人,然而此心不渝,此爱不变,仍来访此寒窑,寻其故妻,此诚亦大可称赏之事。惟其间尚有一枝节,其夫在外已得一番邦公主为新欢。以今人观念

言,若不可恕。而其夫既得新欢,仍念旧情,此情则弥可欣赏。宝钏亦不加罪责,其新欢番邦公主,亦不加罪其夫,而又甘居宝钏之下,一如姐妹,同事一夫。此由今人观念言,亦大非所宜。一夫两妻,大不可忍,认为封建遗毒。然舍事论心,则亦有其未可厚非者。

王宝钏既得团圆,乃亦不忘其对父母之爱,其夫亦曲从其妻,不念旧恶,对其岳父母仍加礼待。即其新欢番邦公主,乃亦曲守中国之礼,善视宝钏之父母,一若己之父母。《大登殿》之喜剧,乃得于此完成。然在此大喜剧之中,乃包有极深悲剧成分在内。悲喜皆在此一心,惟受外面种种事态相乘,不能有喜无悲,亦不能有悲无喜,而此心则完好如一。中国人所追求者在此。

生死恨

韩玉娘的悲喜人生



其次再及韩玉娘。乃一中国女性为金人所俘,在一金酋家作奴。金酋为之择配成婚,其夫亦一被俘之中国人。成婚之夕,韩玉娘乃加以斥责,汝乃中国一男子,乃贪目前小欢喜,忘国家,忘民族,一若此生有托,试问汝将来乌得为一人?盼立志逃亡。我既配汝,此情不变,他年或有再相聚之机会。

是韩玉娘虽一女流,其心尚存有对国家民族之大义深爱。而其夫一时生疑,恐其妻乃为金酋所使,伪出此言,以试己心。乃即以韩玉娘所言告金酋。金酋深怒玉娘,即加出卖。其夫乃深悔前非。玉娘告以此志不渝,可勿深虑,惟速逃亡,好自为人。其夫终逃去。玉娘即卖为人妾,告其买主,彼已有夫。获买主同情,送其入一尼姑庵。乃庵主又计欲出卖玉娘图利,玉娘又乘夜逃离。辗转穷困中,遇一老嫠,收养为女,获免死亡于道途。

韩玉娘乃一青年女性,其婚姻乃亦由外力所迫,仅一夕之期。其夫死生存亡不可知,至其穷达贫富更非可测。玉娘果求别嫁,亦属人情。但后一韩玉娘已非前一韩玉娘,生活纵可改善,其内心人格则已前后分裂为二。果使其心尚存,前一韩玉娘之黑影仍必隐约出没于后

一韩玉娘之记忆中。此其为况之苦,诚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实因富贵在外,求之不可必得。纵得之,亦不可必保。所好则在我。韩玉娘一夕之爱,虽若所爱已失,然此爱则尚在己心,亦韩玉娘之所好也。韩玉娘不比王宝钏,历史中诚有其人其事。则韩玉娘诚不失为中国文化传统理想中一代表人物矣。

韩玉娘之夫,乃亦不忘旧情,身已骤贵,亦不再娶。命人至二十年前成婚旧地附近寻觅,终于得之。其夫乃亲来迎接。夫妇相晤,韩玉娘乃在极贫贱地位中,一旦骤为一贵夫人,瞬息之间,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前之所遭遇,喜者喜其所爱之终获如其所希望。悲剧一变而为喜剧。

但韩玉娘身已染病,终于不胜其情感之激动,乃于重晤其夫之当日辞世。然在此悲剧中,亦仍然不失其有甚深喜剧之存在。此诚中国文化传统理想所寄之一奇境也。

琵琶记

赵五娘的悲喜人生



其次言赵五娘。其夫蔡伯喈赴京城投考,骤获状元及第,受命娶丞相女为妻。而赵五娘在家乡奉侍翁姑,在穷苦困约中,遇岁大荒歉,终于翁姑俱亡,赵五娘遵礼埋葬。又获其乡中旧识张太公之同情,代为护视,而五娘则只身赴京寻夫。其夫亦尚不忘其父母与前妻,派人去故乡访问。而其后妻亦肯恕谅其夫之遭遇,善视五娘,并相偕返乡祭扫。

此乃在悲剧中终成喜剧。然观剧者,终于赵五娘之奉侍翁姑葬祭尽礼之一段深切悲哀中,共洒其同情之泪。要之,既不重外在物质之功利,而珍惜其一心之情感,则人事不可测,终必有种种悲剧之发生。

而且人之情感,悲胜于喜。非有悲,则其喜无足喜。然果有悲无喜,则悲亦无可悲。悲

之与喜,同属人生情感,何足深辨其孰为悲孰为喜。仅求可喜,与专尊可悲,则同为一不知情之人而已。孔子曰“从吾所好”,则有深义存焉。非真知情,则亦不知我真好之何在矣。

三娘教子

薛三娘的悲喜人生



再言薛三娘。其夫远行,失音讯,或讹传其死。其夫有一妻两妾。一妻一妾闻之,同挟家财别嫁。又有一幼子,乃逃妾所生。三娘独留不去,推其夫爱子之心,以养以教,盼其成人。有家仆老薛保,同情三娘,助其教养。乃其夫骤贵,终于回家,其子亦中科第,得官职。夫荣子贵,三娘亦骤成为一贵妇。此亦以喜剧终。

然剧中《三娘教子》之一出,亦为中国有名一悲剧。闻其歌声,无不泣下。较之断梭教子,其情节之悲痛尤过之。而老薛保之忠肝义胆,近代中国人虽亦可斥之为封建遗毒,然观此剧

则无不深感其为人,而加以爱敬。否则必是一无心人,即无情人也。

祭江

孙尚香的悲剧人生



有一纯悲剧还当续述,则为孙尚香之《祭江》。尚香嫁刘先主,乃出吴、蜀对立之国际阴谋。既已成婚,尚香终亦离夫回国。生离犹可忍,死别更难堪。刘先主卒于白帝城,尚香临江祭吊,时仍有老母在堂,而尚香心哀其夫之死,不惜投江自尽。听其唱词哀怨,当无不泣下者。

惟此乃为中国戏剧中一纯悲剧,而尚香爱夫之情,较之上述,尤为特出。中国人重国重天下,重治平大道,皆重情。而夫妇则为人伦之首。此意甚深,可以体会,难以言宣也。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皆人之情感,必发于外,而有其未发之“中”。此“中”即是人之性。喜怒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选摘自《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哀乐皆同具于一性,在人生中,焉有有喜无怒、有乐无哀之一境。故前论,喜剧中即涵悲剧,悲剧中亦涵喜剧,即此义。及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而达于“和”之一境,即无喜怒哀乐明切之分别可言。此“和”字所指,亦重在内,不重在外。

圣人之心,若惟见有道,不见有事。方舜之登廋入井,终皆幸免于死。然岂得谓其心中有喜有乐,抑有哀有怒?方周公之兴师东征,大义灭亲,亦岂得谓其心中有怒有哀,抑有喜有乐?孔子出仕为司寇,岂其心中有喜有乐;腩肉不至而去鲁,岂其心中有怒有哀?大圣人之心,皆惟见其浑然率性,大中至和,渊然穆然,一若无私人喜怒哀乐情感之存在。其实从性生情,从情见性,性即情也,情即性也。



这真的是民国？

◎ 叶曙明

民国时期，大家云集，思潮碰撞，轶事无限……鲁迅的无聊射弹弓，胡适的调侃，蔡元培的办假证、林纾的吹牛x……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真的是民国吗？

鲁迅兄弟的无聊生活



周作人和鲁迅

1917年4月,周作人也来到北京,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

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看胡适如何回敬黄侃



胡适与黄侃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黄侃是坚持文言文者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蔡元培为陈独秀造假学历



北大时的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1915年，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的做法，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胡适的打油诗与流行歌曲



胡适和梅光迪

胡适为了批评古文派，写了首一百多句的白话打油诗给梅光迪。胡适自称这是生平所写最长的一首诗，胡适诗中写道：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听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胡适不仅写了许多“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之类打油诗，也创作了不少精致隽永的抒情诗。1980年代曾红遍神州大地的台湾

校园歌曲《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原词《希望》便是胡适的大作。

辜鸿铭的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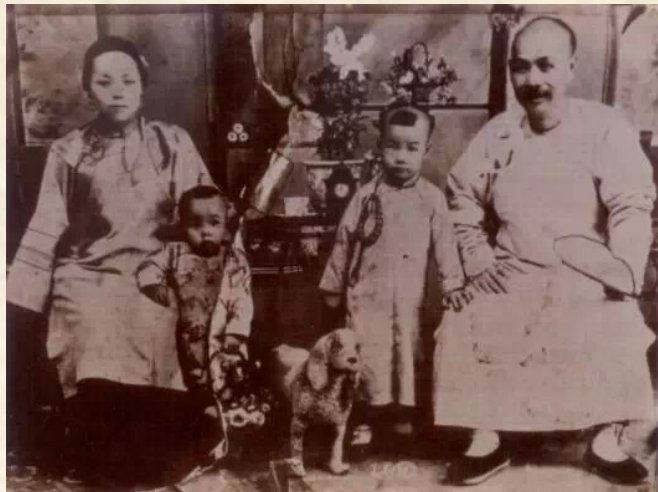


辜鸿铭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

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林纾自吹天下第一



林纾 53 岁时和妻子、女儿合影

林纾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

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社会败类” 吴虞



吴虞

吴虞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的儿子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此事令他对父亲恨之入骨。

1910年，由于家产纠纷，他被父亲告上衙门，最后官府虽判他父亲败诉，但吴虞受到“社会贤达”们猛烈抨击，指他“无君无父”、“大逆不道”。吴虞为了自辩，写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个学堂散发，因此大大激怒了当地旧派势力，骂他外扬家丑，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永远驱逐出四川教育界。

陈独秀扮厨师出逃



陈独秀和李大钊

友人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

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

来信,才说出此行的经过。

明星杂志的诞生



《新青年》创刊号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马上找汪孟邹,说自己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他承印。汪孟邹一听,面露难色,亚东图书馆这时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甲寅》从日本搬回上海以后,也由亚东承印,汪孟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自己还要靠卖杂粮糊口,对陈独秀的杂志,有心无力。

他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给陈独秀认识,经过陈独秀拍胸脯、打保票,唇焦舌敝,自卖自夸,好不容易,才说服陈氏兄弟同意合作,新杂志为月刊,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

编辑费共 200 元。1915 年 9 月 15 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面世了。

1916 年 3 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青年杂志》于是改名为《新青年》。

重赏之下无勇夫



梁启超

1915 年,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9 月 3 日刊登在上海《大中华》月刊,《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梁启超对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作出尖锐批评。他宣称,共和与非共和,是国体问题;立宪与非立宪,是政体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变更政体是进化

现象,变更国体则是革命现象,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

文章一出,洛阳纸贵,市场上卖断了货。购不到报纸,又急于一睹为快的人,只好纷纷辗转抄读。梁启超写得痛快淋漓,人们读得如醉如狂,三月不知肉味。当时《亚细亚报》悬赏三千大元,征文反驳梁启超,但重赏之下,竟无勇夫。

一本畅销杂志的炼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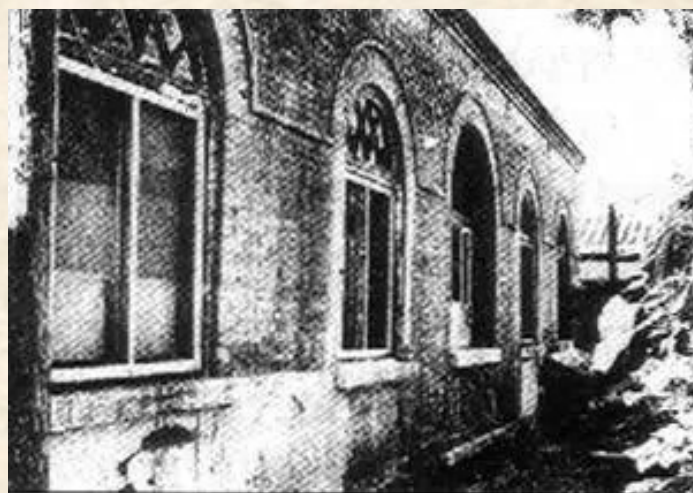
陈独秀(左)和胡适(右)

对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陈独秀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获至宝,立即登在1917年元

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

一篇胡适自称“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的“刍议”,经陈独秀、钱玄同大吹大擂,俨然成了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动一时,激起了轰轰烈烈的议论。《新青年》也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滞销杂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

旧北大的腐败生活



北京大学旧校舍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顾……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

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学生可以轰走教授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胡适在北大开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家伙也照样轰走。傅斯年

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选摘自《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如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金日成（左）与抗联战友柴世荣（右）的合影）

金日成曾是中国第一支特种部队的营长

◎ 萨苏

很难想象，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还有一位邻国的开国领导人，这就是前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

1 . 打出一场疯了的复仇战

很难想象,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还有一位邻国的开国领导人,这就是前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吉林濛江三道河子壮烈殉国。由于杨靖宇深得军心,得知这一噩耗的抗联各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纷纷向日军发起复仇的反击,被敌人惊呼为“打疯了”。

发生在3月25日的大马鹿沟之战便是这“打疯了”的一场战斗。根据日方《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这一天,间岛省警政长前田武市率领的日军警混合讨伐队进至大马鹿沟,即吉林省延边州的和龙一带,遭到一支抗联部队的伏击。

此时,日军组织的联合大讨伐正在顶峰,抗日武装遭到极大的困难。而这支抗联部队却以凶狠刁钻的作战风格在大马鹿沟包围了前田所部,并在连续的攻击中给敌造成重大伤亡。日军指挥官前田武市在要求谈判不成后绝望自杀,所部“全灭”,即遭到全歼。

日方记录中标明姓名的前田部下阵亡人员包括间岛省警正山下精等56名(包括伪满即

中国籍警察两名)。这56人的阵亡名单只标示了日伪警方的损失,此战关东军也有一部队参战,从总共被缴枪一百支以上(日方承认数字)判断,关东军的伤亡也应该在数十人。

这场战斗发生在抗联斗争正遭遇低谷的时刻,在当时引发了极大震动,战后收拾战场的伪警察因为讽刺日本人,双方还差点发生斗殴。

2 . 曾投于杨靖宇麾下

是哪一位抗联将领打出了这样精彩的一场战斗呢?

指挥这场战斗的,便是当时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他也是东北抗联教导旅在维亚斯科成立时的第一营营长。

1930年代中期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是南满抗日游击作战的主力,1938年7月前,在总司令杨靖宇麾下共辖第一和第二两个军,金日成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师长;为了消除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的影响,1938年7月第一路军进行了改编,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与之同级的警卫旅,实际上,每个方面(军)的兵力不过千人,但多为百战精兵,战斗力极强,故

此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金日成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活动于和龙、安图、东宁等地。从战斗序列而言,杨靖宇是他在抗联之中的直接上级,故此才有为杨复仇的大马鹿沟之战。

3 . 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朝鲜抵抗者,金日成怎么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呢?

金日成在自述中解答了这一问题。金日成本名金成柱,曾用名金一星,在抗日战争中改名金日成。他1912年4月15日出生于平壤万景台一个有着反日传统的朝鲜家庭,1925年随父移居中国,后进入吉林市毓文中学学习。

和很多朝鲜有志之士一样,金日成自幼关注朝鲜争取独立自由和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思想比较激进,加入了朝鲜共产青年同盟。毓文中学的校长李光汉是周恩来总理的同学,对于金颇多庇护。金日成到晚年对其仍十分感激。

1928年,朝鲜共产党因为各种原因解散,共产国际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日成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并在

1932年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自己担任队长,从此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员。



(金日成(左一)与抗联战友季青(左二)、崔贤(右二)、安吉(右一)的合影)

4 . 抗日战场上的悍将

对于金日成的抗日生涯,有着诸多不同的记载,但他曾经积极从事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史实是可靠的,而且资料显示金在作战中的确体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在中国相关资料中,有相当多关于金日成在抗联中对日作战的记录。

例如,《宝清县县志》记载,1938年7月金日成曾指挥抗联骑兵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二甲沟

5 .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一营营长

与日军接战,并成功地全身而退。这段记载中保留了普通中国民众对这名年轻抗日将领的印象:“个头不很高,长得很英俊,穿着很朴素”;“头脑非常精明,眼睛看啥事看得也准”;“队伍纪律非常严明,不许进女眷住处,不许与妇女说笑,不许向百姓索要东西”。

而在日本关东军的作战挂图上,也常年可以找到“金日成”的名字及其活动区域。根据日本《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记载,该大队在1939年到1940年的“联合大讨伐”(即致杨靖宇于死地的那次扫荡)中,除刚遭重创的第二中队外,其余三个中队均配备电台,分别追击三个目标,以将目标个人击毙或消灭为目的。

这三个目标,便是杨靖宇将军麾下最能打的三名将领:第二方面总指挥金日成、第三方面总指挥陈翰章和警卫旅旅长朴德范。其中,日军给金日成的代号是“熊”,陈翰章是“虎”,而朴德范是“狼”。三人中,朴德范后被俘叛变,陈翰章壮烈殉国,只有金日成始终让日军可望而不可及,得以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

由以上中日双方共同的记录可以看出,金日成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堪称悍将。

不过,东北战场是日军作为“帝国生命线”经营的,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之时,仍有百万兵力,而抗联在全盛时期兵力也不超过五万名。

由于日军的残酷镇压,抗联部队在1940年前后陷入了极端的困难。金日成在极度困难之中,奉第一路军政委魏拯民的命令撤过边境,退入苏联境内进行休整,驻扎在乌苏里斯克附近。

1942年,经整编,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驻扎在维亚斯克附近。该部共编为四个步兵营和一个无线电台,指挥机构由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以及苏联联络官王新林等组成。金日成在其中担任第一营营长职务。



(抗联教导旅官兵在苏期间合影。前排右侧坐者为金日成；一排右二李淑英(七军战士)，右三金贞淑、右四黄顺姬(二军战士)，右五金哲镐；二排右一沈风山(第一军警卫旅战士)；三排右一柴世荣，右二季青。摄于1941年)

这支部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火种，也是中国第一支使用苏式装备的特种部队，此后的数年中不断以袭扰、破坏、侦察等手段入境作战，在东北境内显示着中国抵抗力量的存在。

入苏后，金日成也曾多次率部入境作战，包括执行寻找魏拯民等任务(证实魏拯民已经牺牲后撤回)，以及化妆侦查日军边境要塞等。1945年8月，盟军对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发起全面反攻，金日成等抗联教导旅官兵也参加了这次反攻，金日成并在战后因抗日功绩荣获苏联红旗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日成率领部分部队返回朝鲜，在盟军支持下建立政府，后成为

朝鲜国家领导人，但他在世之日时时惦念在中国的老战友，并经常邀请他们来朝访问。看来，在抗联的对日作战岁月，是金日成心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本篇内容选摘《中国不会亡》

萨苏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中国不会亡》是作者萨苏先生从日本史料，从“敌人的眼睛”里，发现和记述的中国抗日特工鲜为人知的史实，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敌后谍战，特别是十几宗经典绝杀日伪行动的全过程。全书分“人、鬼、刑、兵”四部分，既有中国特工人物传奇，又有敌方特务组织背景揭秘，还有抗联武装特工和军统培训、特工装备等内情披露，以独特视角，全面、深入展现了中国抗日隐蔽战线谍战史。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尼泊尔,朝圣者的灵魂休息所

◎ 刘益康

一位去过巴德岗的英国旅行家说过,“如果整个尼泊尔不在了,只要巴德岗在,就值得你飞过半個地球来看她……”。如果巴德岗坍塌了,只要虔诚者在,一座代表着朝圣者休息所的古城也会再次崛起。

飞越喜马拉雅

两个天地



从成都出发,十五分钟后,就飞上了高原,雪峰从云海中露出峥嵘。天气尚可,所有的人都挤在机舱窗口,玩命地按快门。不久雪山消失,沿着宽阔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向西飞,下面的辫系河流和日喀则古城,清晰可见。过了日喀则,飞机转向南飞,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飞机的飞行高度是万米左右,七八千米的山峰,好像就在脚下。

过了中尼边界的垭口以后,天气异常晴朗,在飞机的右侧,珠穆朗玛冰峰的雄姿,近在咫尺,终于近距离地看到了地球第一高峰。翻过垭口,飞机快速下降,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加德满都,换了一个天地。一座慵懒、宁静、散乱、随意的古城展现在眼前。距成都两小时,却是两个天地。

古城巴德岗

朝圣者



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加德满都河谷,坐落着古代的三个都城:加德满都、帕坦、巴德岗。三个城市相距不远,现已几乎连成一片。帕坦,位于加德满都南八公里,巴德岗,位于加德满都以东十四公里,是尼泊尔语中的“稻米之城”或“虔诚者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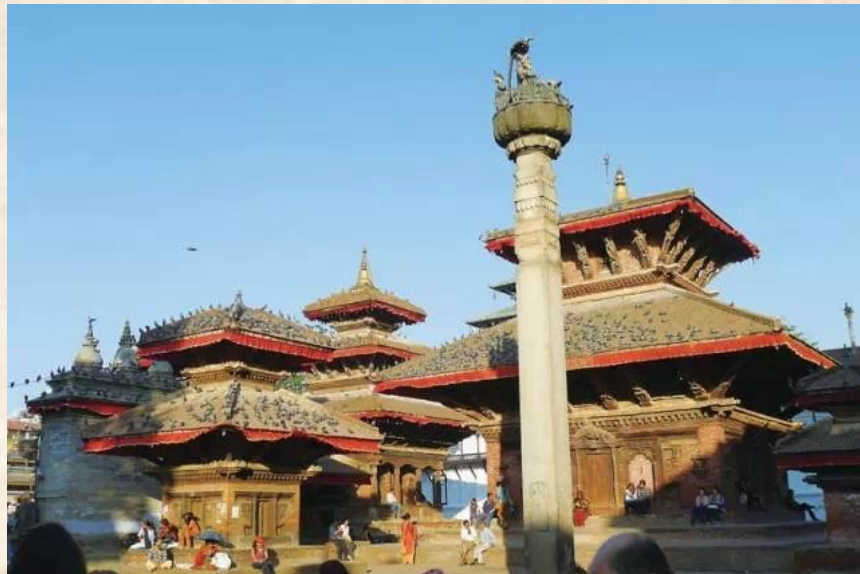
古都是尼泊尔中世纪建筑和艺术的发源地。砖红色是古城的主色调,质朴的红砖、深栗色的精制木雕,再加上密集的寺庙和砖石佛塔,构成了巴德岗独特的建筑风格。

古城保存非常好,严格地说,尼泊尔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病毒,目前还未大规模入侵。在老城区内,不仅是建筑,还有人们的衣着、生活方式,都延续着几百年前的模样。人们脸上的表情,懒懒的,静静的,天塌下来也无谓似的。在全盛时期,巴德岗有规模庞大的王宫,众多的神庙建筑群,还有一百七十二座朝圣者的休息所。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

时光流逝,朝圣者的休息所,依然存在。五百年的光阴流逝,朝圣者的休息,把坚硬的栗色木板,磨出了一个个的凹槽。古城里大街上,晒着稻谷,只有这样低下的生产力,才能抵御了文明对原始生活方式的破坏。有时,心里很矛盾,希望看到古风古貌,以满足农业社会的遗老遗少们,怀古的幽思。但尼泊尔年轻的一代,不希望这样的生活继续延续。西方游客保持环境与古风的呼吁,是否也暗含了自私的成分,我们是否也染上了呢。

杜巴广场 - 皇宫广场

三座古都建筑



杜巴广场意为“皇宫广场”。在马拉王朝第六代国王死后,三个儿子,自立为王。在加德满都、帕坦、巴德岗建三个古都,各有一个杜巴广场。广场中,一座又一座建造精美的宫殿和神庙,形成了独具尼泊尔宗教和民族特色的一片区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没到过这里,你无法想象,这个广场是多么市井,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广场。不像北京天安门广场、莫斯科红场、巴黎协和广场那么庄严肃穆,那么政治化,那么空旷。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既是旅游点,也是市民休闲之处,鸽子在广场上空盘旋,牛在广场上与人共处,夕阳之下,温馨和谐,每个角落,都流淌着美。每个杜巴广场都有几十个看点,每个看

点,都有一个故事。每个看点,从不同的视角,又可以体察到不同的匠心。几百张照片中,只能选几个有特色的点看看。



巴德岗的五十五窗宫,建于1427年。主体宫殿是一座四层砖木结构建筑,墙为暗红色。因其上开有五十五扇黑漆檀香木雕花木窗而得名。宫内有九十九个庭院,还有国王寝宫、吉祥天女游乐宫等。

尼泊尔虽然是佛教诞生地,但80%的民众都信印度教。黑天神属于印度教。用黑天神,祈祷家庭无忧、身体康健。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上有黑天神像,是个煞神。杜巴广场周围,保留了大量几百年前的木雕工匠们留下的硬木雕硬木雕刻,是传世杰作。在一些木结构的寺庙中,木雕之精细,让这位头戴尼泊尔小帽的中国老人,叹为观止。

人在做, 神在看

佛是天下第一



尼泊尔的佛教庙宇,很有特色。斯瓦扬布纳特寺,人们都叫它猴庙,因为庙内有无数的猴子。寺庙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郊两公里处的小山丘上。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佛塔上部金色四方的建筑上,四面都绘有一双佛眼,眉心处的是第三只眼,眼下不是鼻子,也不是问号,而是尼泊尔的数字“1”。其含义是“佛眼无边,无所不在”,能洞察一切,“佛是天下第一”,有无上的智慧。

这就叫做:人在做,神在看。教导每个人都要慎独,人前人后都一个样,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弄虚作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加德满都另一个必去之处,是博大哈佛塔。这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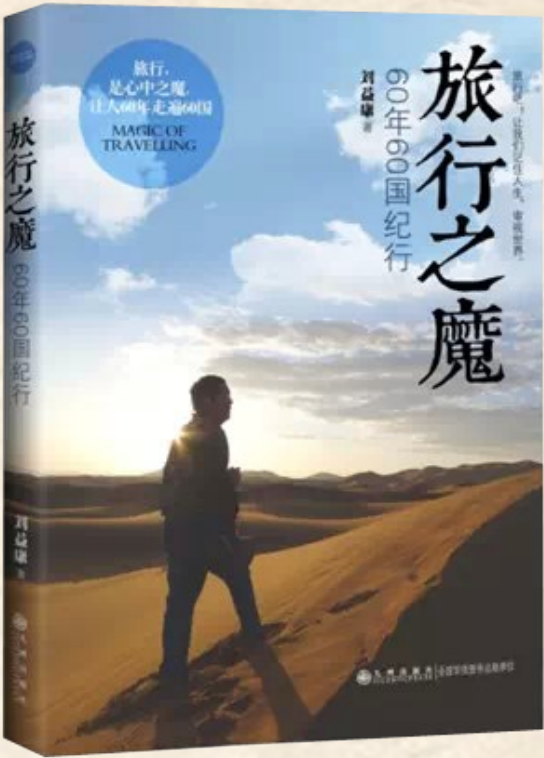
最大的复钵状,半圆形的佛塔建筑。三层八角形平台,衬托出磅礴宏大的气势。以前西藏商人从拉萨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加德满都,首先会到此感谢佛的保佑。博大哈佛塔四周是加德满都的藏人聚集地。这两座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篇图文选摘自《旅行之魔》

刘益康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际知名矿产勘察专家刘益康,六十年在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随笔。从北国芬兰,南到坦桑尼亚。人间天堂新西兰。通过这些生动的记录,作者将独有的睿智与幽默渗透在字里行间,搭配亲手拍摄的数百张多张旅行照片,带你游遍“三分之一世界”。心比天大,世界就在脚下。不要浪费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经典和我们

◎周国平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我的读书旨趣,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

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

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

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就像一个学者只会用这一种读法读经典,我就要断定他不具备大学者的资格一样。

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无论《论语》还是《圣经》,无论柏拉图还是康德,不妨就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

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

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

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本书是作者在阅读经典、直接与大师交流时的感悟和心得,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饱含了作者对人类存在境况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充满了哲思的智慧和诗性的体验。

JZHPRESS,悦读九州

选摘自《经典闲读》

周国平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本书是作者在阅读经典、直接与大师交流时的感悟和心得,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饱含了作者对人类存在境况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充满了哲思的智慧和诗性的体验。

JZHPRESS,悦读九州

选摘自《经典闲读》

周国平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九州出版社官网



微盘



云盘

Copyright ©2015 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芒种